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如何可能

——关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前提性反思

贺 来

摘 要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如何可能,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我们应做的是努力营造符合哲学本性的哲学生态。这种哲学生态包括三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一是焕发哲学的批判意识,避免哲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二是焕发哲学的论辩和说理意识,避免哲学的话语霸权,推进哲学共同体内部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建立良性的哲学创新机制;三是进行充分的学术积累,以自觉的现实感为基础,批判性地吸取外来哲学学术和思想资源,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夯实基础。

关键词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哲学的批判精神;哲学创新机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B-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0)02-000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242)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目前哲学界许多人都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这一任务和课题的核心,就是要在当代世界哲学的背景下,生成和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构建,需要一系列内在外在的前提和条件作为支撑,本文即是要对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内容进行探讨,以期推进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营造符合哲学本性的学术生态: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前提

仔细考察人们对当代中国哲学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可以发现,当人们使用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包含两个不同维度。一是实然维度。在此意义上,这一概念要回答的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实际存在形态是什么,它要求的是对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状况和格局进行概括和提炼,总结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和总体动向。对此,哲学界学者均可根据自己的观察,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做出不同的分析和判断。二是应然维度。在此意义上,这一概念要回答的是:我们如何在新时代的理论 and 现实生活语境中,建构真正能表达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哲学话语,创造体现和引导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当代中国哲学理念。

从这两个不同维度对当代中国哲学形态进行探讨各自均有其重要意义。事实上,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分离的。从实然意义上梳理、总结和反思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成果,厘清、提炼其中正在孕育和生成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将为应然意义的当代哲学形态提供坚实的准备和基础。反之,从应然意义上深入思考和憧憬当代哲学形态的理论理想,将为反观现实的理论状态及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不可缺少的思想参照和价值尺度。

本文的探讨主要侧重于第二个层面。我们认为,应然层面的探讨具有特殊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

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P15)这一论述指出了实然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从应然的意义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它表明,对包括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言,都面临着一个面向未来建构其当代形态的重大课题。

从应然层面出发理解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内涵,国内学者已经提出了多种主张。例如,有学者认为,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有学者认为,西方中心论从思想方法上阻碍着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必须超越西方中心论,通过中国哲学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凸显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这种主张最典型的表述是,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宣言,有学者强调对话与融通,有学者强调以和谐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关键和核心范畴,等等。应承认,上述主张均有其各自合理性,表达了学者们对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构建的理解和期许。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使用过意识形式这一概念,他把精神现象学称为“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认为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的科学或知识的这个形成过程”^[2](P17),在此过程中,“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2](P55)。按贺麟先生的阐释,黑格尔所谓的意识形态包含思想体系、观念形态、精神现象等涵义,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哲学形态。在黑格尔那里,意识形式或哲学形态意味着精神通向真理过程中的内在环节,代表着在某个阶段占据主导地位,代表着精神运动的必然性的思想体系或话语系统。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哲学形态或意识形式是精神劳动的历史性产物,精神现象学只是对它们的呈现和描述。因此,一个时代创造出何种哲学形态,人们既无法按照某种既定原则进行预测和计划,更无法依靠外力强制交出答卷,而是精神经历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的产物。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对何谓当代哲学形态作过深入阐发。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以一种观念的形态表达的德国的未来的历史,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通过对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就能“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 [that is the question] 的那些问题的中心”^[3](P9)。只有在对时代的中心问题的自觉理解中,超越德国思辨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才能建构起真正面向未来的当代哲学形态。

黑格尔关于意识形式的现象学观点和马克思对当代哲学形态的深刻见解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它启示我们: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构建仍是行走在路上的未完成时,是一个仍在召唤人们上路、以创造性的工作去推进的未来的事业。或者说,它仍是一个不在场的存在。因此,今天我们讨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构建这一问题的时候,应该充分自觉到:在当代中国形态的哲学真正被创造出来并获得人们普遍认同之前,一切谈论都可能是外在和主观的,难以摆脱外在反思的窘境。

因此,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许可以转换问题的提法,以如下方式提问: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构建如何可能?或者更具体地说,要生成真正代表时代文明水准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才能破茧而出?

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是尊重哲学的本性,努力营造符合哲学本性的哲学生态。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创生既不可能靠计划,也不能靠进口,而只能为其准备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推动其自由孕育和生长。就像种子只在合乎其本性的条件下才能生根发芽一样,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也只能在合乎哲学本性的生态中形成。这种生态包含的因素当然是十分丰富的,但如下三个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一,焕发哲学的批判意识,避免哲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第二,焕发哲学的论辩和说理意识,避免哲学的话语霸权,推进哲学共同体内部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建立良性的哲学创新机制;

第三,进行充分的学术积累,以自觉的现实感为基础,批判性地吸取外来哲学学术和思想资源,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夯实基础。

二、哲学的批判本性: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所需的重要理论品格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构建需要焕发哲学的批判本性,并因此避免陷入哲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倾向。批判性构成了任何真正哲学的重要特质,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思想品格。儒学以仁爱、仁道为本,对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状况和社会风气以及教条化的正统观念进行批判,既构成其重要的超越性的精神维度,也是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自我更新重生和创造性转换的重大推动力量。孔子对周秦之变时的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充满批判精神,怀着“哲人其萎”“吾道穷矣”的孤独和愤懑,惶惶如丧家之犬。可以说,对现存世界自觉而深刻的批判态度,是其精神世界中最富感召力的方面,遗憾的是,恰恰这点被不少主张国学、尊崇孔子的人们忽视和遗忘。西方哲学虽然流派众多、历史悠长,但苏格拉底奠定的“雅典牛虻”的批判精神贯穿始终,正如伯林概括的那样,西方哲学家们相信,“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4](P3)。马克思哲学继承了以往哲学的批判传统,同时又克服了其不彻底性,并成为哲学批判精神最伟大的典范和代表。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但认为这种批判精神最终落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3](P204)的结局。因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克服这一缺陷,以彻底地落实和体现哲学的批判性品格,他要把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内在地结合起来,“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P22)。

可以说,中西马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创立和发展,都是在其各自的理论地平线上对哲学批判精神的深刻焕发和彰显。今天,我们要努力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同样不能遗忘哲学的这一本质性精神品格。

然而,反观现实的哲学生态,上述的哲学的批判性品格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哲学应有的批判力量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相反,马克思指出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却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的哲学意识。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虽然我们的哲学研究在专业化、精致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但与此同时,那个年代围绕着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变革、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等进行的哲学反思批判工作,以及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的人们敏锐炽热的真诚朝气、对权威和教条的大胆质疑反思、希求发挥哲学特有的反思批判功能、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执着和勇气却不断消退,甚至被当成嘲笑的对象弃于一旁。面对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权力逻辑日益侵蚀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趋势,我们亟须哲学深入社会历史现实,辩证地揭示它们的内在界限和矛盾,为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哲学特有的作用;面对我们思想中存在的束缚人与社会发展、制约思想解放的种种抽象观念和僵化教条,迫切召唤哲学发挥反思批判功能,推进哲学观念变革与思维方式的转换。与这种急迫的需要相比,当代中国哲学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认为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深入而翔实的揭示和批判,并指出其使用的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我国有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迫切需要创造出像《21世纪资本论》那种充分发挥哲学批判精神的作品。

保持哲学的反思批判意识、升华哲学的反思批判能力,对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任何真正的哲学的重要精神气质。哲学的批判不是流俗意义上的否定和拒绝,也非道德和政治上的审判,更不是真理在手、居高临下的裁决,而是一种厘定界限的哲学前提批判活动。通过厘定界限,揭示那些支配着人们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有限性,破除它们对人的思想和现实生

活的遮蔽和扭曲,从而推动人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①,这种批判活动构成了哲学的基本工作方式。失去哲学的这一维度,也就失去了哲学之为哲学的理论品格,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就无从谈起。

更进一步,只有发挥哲学的批判本性,当代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切中和深入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并在此过程中获得真实的问题意识,确证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不可替代的思想力量。正如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构建,必须自觉地关注中国社会历史现实,这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哲学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具有与其他学科和文化样式不同的特点、方式和目的,只有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关注中国社会历史现实,才能发挥其作为人类思想的特殊维度的特有功能。所谓哲学的方式,一个极为重要的体现就是哲学的批判本性。40多年前,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我们正是充分发挥了哲学的批判本性,才破解了“两个凡是”对人和社会发展设定的抽象界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乃至世界哲学发展史上,为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改变现实确立了典范。在今天不断深化改革的路途中,我们同样迫切需要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突破阻碍人与社会发展的种种观念和体制机制的障碍,切实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展;突破种种把人工具化的陈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确立把每一个人真正视为目的的观念;克服把抽象的共同体与个人对立起来的观念并确立独立人格和个人自由发展的观念;克服用权力侵害权利的观念并确立每一个人平等权利的观念,等等。所有这些重大的现实和理论课题,都为哲学发挥思想批判功能从而以哲学的方式介入现实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哲学通过对这些课题的批判性回应,将既克服对中国现实的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也克服对中国现实的“抽象的能动的理解”的思辨唯心主义片面性,而真正贴近中国现实生活的本质,从而达到对它的实践性的理解^[3](P503)。只有这样,哲学才能获得对中国社会生活历史方位的深入判断和理解,捕捉我们特有的思想主题,成为既内在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同时又引导其向未来敞开的超越性思想维度。

更重要的是,只有保持哲学的批判立场,当代中国哲学才能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人类性的视角,真正切中我们时代的普遍性问题,并因此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切实发挥当代中国哲学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特有作用。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德国古典哲学:“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al pari]德国历史。”^[3](P9)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康德,马克思则认为应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3](P233)。之所以如此,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古典哲学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思想穿透力,克服了德国狭隘的民族局限性,批判性地捕捉到时代性的普遍问题。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仍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一种缺乏批判精神的哲学必然陷入对现实的肯定主义和非反思态度因而无法透过现象捕获当代生活的本质,只有禀赋批判精神的哲学才能成为当代哲学的同路人。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人们或者用后殖民时代、后冷战时代、后工业时代来描述,或者用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来概括。不管如何描述和概括,它们都表达了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生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这些变化,各门具体学科从自身不同学科视角出发进行了专门性的探讨和揭示,只有哲学,才能透过这些变化的表象,对它们进行前提性的批判反思:时代的变化意味着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等人生在世的根本性向度呈现出何种新的本质特征;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支配和控制着人的抽象力量呈现出何种新的特征、表现形式和趋向;如何才能克服这些对人的新的支配和控制形式并探求可能的人的解放前景;面对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应改变哪些过时的、僵化的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确立何种哲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去理解和回应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等等。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批判性追问,当代中国哲学才有可能捕捉我们时代的普遍性课题,并为当代世界哲学贡献我们特有的思想智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失去了哲学的批判精神,也就失去了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和文化特有维度的存

① 对于“哲学批判精神”的详细探讨,参见贺来《何谓“哲学意义的批判”》^[6]

在合法性,失去了其切中当代中国和人类生活实践的特有思想穿透力。在此意义上,寻求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彰显哲学的批判品格具有前提性的重大意义。

三、生成健康的学术创新机制: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重要条件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构建,还需要焕发哲学的论证和讲理这一重要的精神品格,避免和放弃对话话语霸权的寻求,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良性互动和合作中形成健康的学术创新机制,这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考察哲学发展史可以看到,一切重要的哲学创造都离不开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学术创新机制。这一创新机制,不仅是指诸如学术评价、学术管理、成果发表出版、学术传播等外在的、形式性的机制,更主要的是指学术共同体内部良性的沟通、交流和合作机制。这种沟通、交流和合作机制既体现在哲学思想者和研究者们思想立场和学术观点之间,也体现在哲学活动的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关系之中。

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和学术活动,首先意味着它必须通过语言和概念表达思想。哲学的话语中凝结着其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理解,正是在此意义上,哲学被称为世界观。作为世界观,哲学与具体科学不同,后者以具体事物及其规律为对象,考察贯穿具体事物和对象之中的具体之理;哲学的道理是反思性的,它与我们如何理解世界关联在一起,注重的是人怎么认识世界(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怎么言说世界(哲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在此意义上,哲学作为世界观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人的观点和视角。

哲学体现的是人的观点和视角,这一特性决定了任何一种哲学观点都不可能掌握所谓绝对真理。这是因为,任何人的观点和视角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有限性和历史性,这是人的观点与神的观点之间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曾批评黑格尔哲学是“思辨化的神学”,认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7](P25)。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用来掌握具体的思维与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即存在区别开来,认为黑格尔的幻觉在于认为其实在与思维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并因此具有同质性和统一性,这种幻觉必然把哲学视为“说完一切”的上帝的化身。这也正是黑格尔哲学被现当代哲学诟病和批评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由于哲学体现的永远是人有限的观点和视角,这决定了哲学永远处在公共的论辩和对话之中。通过与其他不同哲学观念和理念的对话和论辩,不竭地行走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这是哲学重要的精神品格。“无对话则无理性”,哈贝马斯的这名言极为中肯地说明了哲学的这一精神品格。可以说,哲学在本性上就是拒斥话语霸权的,通过讲理、对话和论证来阐发和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自觉拒斥话语霸权的诱惑,如同伯林曾引用的熊彼特的名言表达的那样:“认识到一个人的信念是相对有效性,却又能毫不妥协地坚持它们,正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地方。”^[8](P246)这应是真正的哲学思考和研究应有的理论自觉,当然也应是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不可缺失的精神维度。

同时,哲学作为理论和学术活动,又是一个由多个环节和维度构成的活动体系。尤其近代以来,随着哲学成为现代学科建制中一个独立的学科,哲学活动包含的学科分支、工作领域、研究方式等越来越多样化,其中既有哲学思想家们以创造概念、形成观点为旨趣的个性化的理论探索和思想表达活动(我们称为哲学创作),也有围绕前人哲学思想和文献、哲学思想的演变和逻辑等进行专门探讨的哲学研究活动;既有侧重纯粹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也有致力于现实问题的实践性研究;既有偏向文本整理、考证和梳理的专门探究,也有注重纯粹学理性阐释和反思的工作;既有对外国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等不同类型哲学的研究,也有伦理学、科技哲学、美学等专门领域的研究;等等。

上述不同环节和维度构成了完整的哲学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用生态链来比喻哲学活动的展开过程,那么,这些不同环节和维度就是使这一生态链得以可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它们处于良性的互动和彼此的合作关系之中,哲学活动的

生态系统才能充满活力。我们可以以哲学创作和哲学研究二者的关系为例说明这一点。在二者关系中,哲学创作是哲学研究的源头,正如文学研究必须以文学家创作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一样,如果没有哲学家的哲学创作,后人的研究将无从谈起。同时,哲学创作还构成了哲学研究的目的和归宿。一方面,人们通过哲学研究,厘清哲学的重大问题,反思哲学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分析哲学创作的经验教训,总结哲学创作的一般原则和规律,阐释哲学创作背后深层的动机和意义,等等,最终目的是为了催生出创造性的哲学作品。另一方面,哲学研究又是孕育哲学创作的准备和基础。哲学创作并非空穴来风,总是依赖一定的思想学术资源,需要对前人成果有系统的了解,任何真正的哲学创作总是孕育和生成于深厚的哲学研究底蕴之中。哲学创作与哲学研究的这种关系贯穿在全部哲学发展史中^①,二者保持良性的循环和互动,是哲学长远健康发展的重大前提。其他诸如基础研究与现实研究、文本研究与阐释性研究、专门领域的研究与总体性的研究等之间的关系也无不如此。可以说,如果哲学活动的这些不同环节和维度能够彼此合作和相互尊重,那么,它们就将形成合力,并营造出一种有利于哲学发展的学术创新机制。

然而,反观我们的现实,哲学的论证和说理这一十分可贵的精神品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相反,从各自不同角度出發,寻求话语霸权、拒斥哲学的论辩和讲理,却成为现实中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现象。其中典型的表现,诸如,中西马的一些学者基于学科中心的话语霸权欲望,从各自狭隘的学科视角出发,以自身学科为中心,试图占据话语权力,贬抑其他学科的存在价值。部分主张儒学的人持一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强调不仅要在思想上,而且还要在现实生活的各方面,确立儒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从事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些学者那里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又如,基于价值优越感的话语霸权欲望,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个人本位与共同本位之间等等,每一方都以自身为中心,不是对它们本来非常复杂的关系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辩证,而是试图宣称另一方为非法。再如,基于个人和群体学术利益的话语霸权欲望,这尤其表现为一些人在现有的学科评价体制之内,为了维护和提升话语影响力,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和占有的文献等中心化,以谋取学术权力以及学术权力背后的利益,等等。

无论是基于学科中心的话语霸权,还是基于价值立场和学术利益的话语霸权,都是不讲理的、违背哲学论辩本性的典型表现,由此必然造成对哲学健康生态和创新机制的损害。在此情形下,正常的学术积累和思想交流将让位于无意义的话语争夺,从而导致“不得分的游戏”的严重后果。很显然,在此哲学生态中,要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必然面临巨大的困境。

同时,哲学活动包含的各重要环节和维度之间形成良性的合作机制也仍是一个亟待实现的目标。从事哲学研究者忽略甚至嘲弄哲学创作的努力,有志于哲学创作者也存在轻视哲学研究的倾向,有人把这种状态概括为经学与理学、为学与为道、思想与学术的分裂;坚持文本研究者批评理论创新和现实关注的研究旨趣缺乏学术含量和层次,后者则指责前者寻章摘句和脱离现实;重视文献、人物和流派研究者批评致力于中西比较和综合创新的学者任意嫁接和武断任意,后者则批评前者视野狭隘和原创性欠缺;至于中西马等哲学领域之间的互设樊篱、各自为政,更是久为学界所诟病。所有这些都表明,学术共同体内部对哲学活动各环节和维度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还缺乏真正的自觉。

因此,避免话语霸权的诱惑,自觉意识到哲学话语的边界和有限性,努力营造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包容性的学术发展态势,放弃话语权霸权,创造在思想论辩中展示自身解释力与说服力的学术氛围,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言,鼓励开展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同时避免哲学活动中各重要环节和维度相互漠视、脱节和对立,促进它们的良性互动,建立健康的学术创新机制,这才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① 对此的详细探讨,参看贺来《确立“哲学创作”与“哲学研究”的良性循环关系》^[9]

四、学术积累与现实感: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重要基础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构建,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必须不忘本来并借鉴外来。不忘本来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其中,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在学术积累中积淀为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学术创新,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借鉴外来意味着吸收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外来哲学资源,但借鉴外来要成为推动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建构的内在推动力量,一个前提是要求学者们具有自觉的现实感。

这里的学术积累不仅指学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更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哲学学术思想资源的积累。学术积累的自觉,是对同代人和前人的哲学思考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清理、总结、反思和吸取,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哲学思考和研究的背景和视域,从中获得可进行深入对话的学术话题,汲取深入研究需要的学术资源,生成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探索的学术方向。

哲学发展史充分证明,对学术积累的自觉是哲学创造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康德的批判哲学直接源于近代以来经验论和唯理论思想成果的积累以及康德对它们的跨越性批判;黑格尔哲学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和学术积累合乎逻辑的产物;马克思的哲学创造直接建立在法国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学术和思想积累的基础上,等等。阅读西方重要哲学家的著作,经常可以看到,他们通常是通过对话、反驳、辨析、反思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问题、展开阐发、提出观点、进行论证,从而使哲学的学术和思想形成一个有着内在传承并在传承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思想谱系;观察西方哲学当代的发展可以发现,书评,即是对同时代学者的成果进行严肃认真且深入的分析、讨论和批评,已成为哲学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和部分,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不是偶然的,它们都体现了学术积累对哲学发展具有的特殊意义。

学术积累对哲学发展的这种前提和基础性作用,根源于哲学的本性。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是建立在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历史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哲学的历史性根植于人的历史性,是对人的历史性的理性映照。对哲学历史性的自觉和尊重,即是对人的历史性的自觉和尊重。冯友兰先生曾强调,哲学研究有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基本方式,前者是哲学史家的工作,后者是在前人肩膀上,对前辈工作的吸收、扬弃和超越。可见,无论是接着讲还是照着讲,都离不开对学术积累的自觉。

然而,反思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发现,缺乏对学术积累的自觉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例如,我们缺少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代学者做出的重要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的认真的清理、吸收和积累,我们在不断从国外引入大师概念的同时,却对我们的前辈们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中,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获得的艰难探索成果缺少应有的重视;缺少对同时代人学术成果的严肃认真的分析、反思、借鉴和研究,我们在强调国际学术交流的同时,却对同属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当代中国哲学学者们的思想成果缺少应有的注目;缺少对我们自己的学术思想成果深层次的回应、对话、相互激发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推进和深化。深入的学术批评十分罕见,本来应作为深入学术批判载体的书评,很多却成了表面、廉价的应酬和吹捧,即是这一现象最典型的表现之一。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对自身学术积累的漠视,这种漠视导致我们难以形成可以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完整学术传统,一代代学人之间的工作尚没形成应有的传承、反哺和递进的传承逻辑和进化谱系。很显然,这种状态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同时,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还要求我们在借鉴外来哲学思想时必须以自觉的现实感为根基。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构建必须借鉴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外国哲学的思想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哲学学术思想的借鉴,对改变我们的哲学观念、提升学术水准、开阔思想学术视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着眼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这一目标,则需要从一个更高的标准深入思考:究竟如何借鉴外来?借鉴外来的立足点和根基是什么?

我们认为,对外来哲学思想的借鉴必须以健全的现实感为基础。现实感意味着,在进行哲学思考和

借鉴外来哲学思想时,必须对其所处具体现实语境有清醒的自觉,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语境进行抽象的理解,更不能脱离我们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语境进行哲学思想的简单移植。从某种预想的理论模式出发,试图用这种理论模式控制和制服不同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生活现实,忽视人类生活的生动性和具体性,导致现实的复杂内容被忽视、扭曲和遮蔽,这种缺失现实感的借鉴外来的方式必然走向歧途。

对现实的自觉,基于对哲学思想本性的深入理解。哲学在根本上代表着对人的生存根据和生命意义永不停竭的追问活动。人的生命不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幽灵,而总是存在于具体的情境和场域中。因此,哲学对人的生存根据和意义的追问和反思活动,就不是脱离时空的抽象演绎和思辨,而是针对具体的、特殊的生存境遇和生命状态的发乎时势的追问和反思。这就意味着,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人生命存在经验和生存命运的自觉体认与观照,其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生成于其特殊的生命历程。事实上,如果深入追究就可进一步发现,即使同属西方哲学,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美国哲学等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和个性。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各自面临的生存发展挑战、历史文化传统和生命历程无法纳入一个同质性的理论模式。因此,把西方哲学某个阶段的反思主题和理论内容不加反思地平移到异质的语境中,就可能导致种种错位。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无疑需要向境外哲学保持开放的态度和具备一种世界的眼光,这一点不容否定,但这需要以我们的生活世界为根基,立足自己独特的生命经验,去反思和追问我们特殊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命运,我们的苦难与希望、创伤与追求都是其他哲学形态无法代替的。唯有通过这种追问,形成我们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想主题,并形成独创的思想成果,才有可能获得与西方哲学比肩和对话的话语权,在世界哲学图景中获得不可取代的地位;也只有这样,我们对外来思想的借鉴才能结出真正重要的果实。

然而,反思现状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忽视具体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以及不同的现实生活实践的特点和历史方位,我们经常无批判地把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平行位移植到当代中国哲学语境中,结果造成问题意识的错位、价值坐标体系的误置、反思批判内容的扭曲。

例如,在我们的哲学界存着一种对理性主义的简单拒斥态度。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理性、启蒙尚是得到弘扬的价值,但近年来,受现代西方哲学激进的对理性主义批判和解构思潮的影响,理性主义、理性精神在我们很多哲学工作者那里,似乎成为一个贬义词,意志、欲望、身体等概念变得时髦起来。无疑,抽象的理性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独断性与独白性,确实应该予以批判性反思,但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现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反思,是在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之后,理性成为绝对的主宰并因此走向反面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此不同的是,在中国既有理论传统中,逻辑、理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精神等等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种种反智主义的非理性现象仍然亟须理性力量的启蒙。在此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具有更多的现实感,更多地借鉴西方古典哲学的理性精神,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反理性或超理性倾向保持应有的批判、反思和警惕?

再如,对近代以来的主体性观念及其代表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拒斥,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大主题。受此影响,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哲学工作者那里,主体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价值、人的解放等都被视为宏大叙事、形而上学的话语而被冷落。无疑,抽象的主体性由于其自身的实体性和绝对性,确实已暴露出深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对此确应进行深刻的反思。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主观性的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在现代性的追求和建构仍然是中国社会最重大的现实主题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应该在反思和批判主体性观念的抽象性的同时,剥离并吸取其合理内核,并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环节呢?我们是否应该形成这样的理论自觉:只有以充分吸收近代主体性思想的合理内核为基础,才能谈得上扬弃和超越主体性及其价值?

又如,近年来在我们的哲学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成为最重大的主题。毫无疑问,在资本成为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绝对逻辑,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唯一法则的情况下,对资本逻辑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确应成

为哲学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此而言,现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巴迪欧、布朗肖、阿甘本、奈格里齐泽克等激进左派思想家们对资本逻辑做的深刻批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然而,我们却鲜有看到有人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对资本发展的辩证意义进行深入的辨析,尤其是对资本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马克思曾阐发的个人独立性、培养社会契约精神和民主意识、推进人与人以及国家民族之间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进行深入的阐发。所有这些,都是资本在历史上扮演角色的重要维度,缺少后者,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将是片面的和非历史的。

以上这些,实质上都是我们在哲学思考和研究中借鉴外来时现实感缺失的不同表现。克服这种倾向,以自觉的现实感为根基,我们对外来哲学思想的借鉴才能创造性地转化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内在的思想学术资源。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麦基. 思想家. 周穗明,翁寒松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贺来. 何谓“哲学意义的批判”. 探索与争鸣,2016, (6).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伯林. 自由论. 胡传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9] 贺来. 确立“哲学创作”与“哲学研究”的良性循环关系. 哲学动态,2006, (10).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 Reflection on Its Preconditions

He Lai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is an important task, which requires us to respect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and make great efforts to create necessary preconditions for its development. Three most fundamental aspects are: to keep and promote the critical spirit of philosophy and avoid obedient and non-critical positivism, to develop the consciousness of reasoning and argument of philosophy and avoid the hegemony of discourse so as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in the philosophical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o establish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through full academic accumulat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the sense of reality for philosophical scholars in order to absorb external academic resources in a critical way.

Key words the 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the critical spirit of philosophy;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philosophy; academic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 收稿日期 2019-07-16

■ 作者简介 贺 来, 哲学博士,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吉林 长春 130012。

■ 责任编辑 涂文迁